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文学艺术（第二辑）

What is Art

艺术论

〔俄〕托尔斯泰(L. Tolstoy)著 耿济之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文艺学术（第二辑）

What is Art

艺术论

〔俄〕托尔斯泰 (L. Tolstoy) 著 耿济之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术论/李天纲主编。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7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文学艺术)
ISBN 978-7-5520-1864-6

I. ①艺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艺术理论 IV. ①J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215号

艺 术 论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-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-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印 张: 18.25

字 数: 24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864-6/J.053

定价: 94.00元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二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法等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、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拟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来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[俄] 托爾斯泰 (L. Tolstoy) 著 耿濟之 譯

藝 術 論

中華民國十年三月初版

序言

俄羅斯的藝術家與批評家，自倍林斯基 Belinsky 與杜薄羅林蒲夫 Dobrolyubov 後，他們的眼光，差不多完全趨於『人生的藝術』（Art for life's sake）的立足點上。唯美派，神秘派的文學及他種藝術，多被他們攻擊得體無完膚。這也是因為俄國的環境關係。俄國自那個時候來，政治上的黑暗，日增一日，農民的痛苦，也深印人心，積極的要求解放。在這慘澹痛苦的環境裏，自然不能不排斥一切娛樂的，無目的的藝術，而力求有益的，切於人生的藝術了。

托爾斯泰 Tolstoy 也是主張『人生的藝術』最力的一個人，這本藝術論（What is Art？）所講的，差不多比什麼人都激烈。杜薄羅林蒲夫他們所說的，不過是要求一切藝術要切合於農民與為農民而活動者的需要而已。

托爾斯泰則更進一層，毫無顧忌的把現代所稱爲藝術的根本推翻，自立一種藝術的定義。他說：現代的藝術是徒然費去許多人的勞力，犧牲許多人的生命，滅絕人類相互的愛情的。藝術家須借重工人的助力，爲藝術所費去的金錢，也全是從那些不能享受藝術所予美感的娛樂的人民那裏得來的，況且現代所稱的「藝術」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，也完全不能確定。爲這種不能確定是什麼東西的「藝術」，而居然犧牲了許多人們的勞力，生命和道德，真是不值得呢。持了這種見解，他在書中舉了許多的例子，拿來痛下攻擊。然後自己創造一種「藝術」的定義。他的藝術觀與別人又有不同，不惟是人生的，並且是宗教的。他以爲藝術——最偉大的藝術就在表現其時宗教的意識，藝術家的本務，也就在以宗教的意識，傳布於公衆。藝術是能征服暴力的，是能創造愛的王國的。他又藝術的範圍放廣，以爲藝術是偏於人類生活之全體的現在所謂藝術，僅其小部分。我們的生活，

自兒童的遊戲，至宗教的事業，無不可視為藝術的表現。他又以為藝術作品是必須通俗的——民衆化的。如果不能通俗，那就是無益有害的了。要而言之，托爾斯泰是以藝術為一種革命的或征服暴力，創造愛的世界的工具的。他並不否認藝術，他不過否認現代的貴族的娛樂的有害的藝術而已。

這是這本藝術論中所言的大要，也就是托爾斯泰對於藝術的主張的大要。

許多人不同意把藝術論在現在的時候介紹到中國來。他們的意見是：托爾斯泰的主張過於偏激。中國現在正在提倡藝術的時候，似乎不可把這一家的偏激的學說，拿來打消大家的美的——藝術的興趣。他們這些話完全是差了。托爾斯泰的學說，誠然是有一些偏激，但是却正好拿來醫治中國的病。中國的藝術向來是以娛樂為宗旨的。除了戲劇以外，一切的

藝術都是貴族的，非人生的。到了現在，連戲劇也要貴族化了——鄉間的游行的露天的戲劇漸漸的減少，城市的固定的靡費的戲劇却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。托爾斯泰這種民衆的，人生的藝術主張，實在足以醫我們的這些病。況且中國的藝術，又多是「無目的」(No Purpose)的，什麼琴棋書畫，什麼小說詩歌，駢體散文，都是以陶冶性情爲惟一的宗旨，都是偏於個人，而非社會的，偏於空幻，而非人世的。這種『有目的的藝術』……(Arts of Purpose)的主張，正是對症良方，決不能以其偏激而棄之——或正因其偏激而取之呢。至於說到打消美的——藝術的興趣的話，更是不對。什麼是美？什麼是藝術？這本藝術論辨的很詳細了。我也不用多講。我總覺得中國現在正同以前的俄國一樣，正在改革的湍急的潮流中，似乎不應該閒坐在那裏高談什麼唯美派……而應該把藝術當做一種要求解放，征服暴力，創造愛的世界的工具。

因此我歡迎藝術論的介紹，歡迎革命的詩人，人道的藝術家的出現。
一九二〇・八・二十・鄭振鐸於北京。

譯者序言

我費了一個半月的工夫，把托爾斯泰的藝術論譯成。譯完後，不得不把我所以要翻譯這本書的意思寫出來。我覺得中國不但沒有托氏所稱的真正藝術，並且連人家的假藝術都夠不上；大胆說一句話：還沒有藝術。難道鑼鼓喧天，塗抹花臉，發出驢鳴狗叫似的聲音便能算藝術麼？難道字句推敲，限就韻脚，做成感時傷春的詩，便能算藝術麼？藝術是與人生極有關係的。這些東西在我們生活上發生出什麼影響？恐怕不但沒有影響，並且還生出惡影響來。因為這些東西能使享受他的人心地變成惡劣，淫巧，或者不致於如此，却至多也不過博得享受者之一樂，決不能因之生出什麼情感來。藝術而沒有情感寓在裏頭，那便不是藝術，祇是『藝術的贗造品』罷了。中國既無藝術可言，所以現在便有建立新藝術的必要。但是建立新藝術，須從研究藝術起，而論藝術的書又在必讀之列。托氏這本書議論

精闢，見識獨到，實堪稱爲藝術書中最佳之著作。所以我把他譯出來，以引起國人研究藝術的興趣。現在中國研究藝術的書少得很，如果這部書出版後，再能繼續有幾部同類的書籍出世，那是譯者的希望啊。

（九年八月十九日）